

泸夷与宋代泸州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及其争论

黄 博¹ 吴 寰²

(1.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2.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 泸夷的存在, 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 以御戎为急, 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 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 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对川南社会影响力的强化。因此, 其时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大政方略。但部分士大夫则认为, 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从历史经验看, 较之军事实力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亦是宋朝稳定西南不可或缺的元素。

关键词: 宋代; 泸夷; 泸州;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20)04-0054-07

doi: 10.19742/j.cnki.50-1164/C.200407

泸州自古以来就是川南重镇。唐代在泸州设置了都督府。宋代泸州先为泸南沿边安抚使驻地, 后兼领潼川路安抚使, 成为全蜀四路帅臣所在地之一。到南宋中后期, 泸州更是在南宋全国十六个路级帅司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刘复生教授曾详论泸州在宋代“权任益重”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泸夷成为宋代川南多民族社会的一个经常引起军事纠纷的因素, 是泸州日益被宋王朝倚为军事重镇的原因^[1]。可以说, 泸夷是宋代泸州地方治理中最重要的军事因素, 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泸州地位的提高, 与泸夷问题的激烈化和长期化密切相关。尽管在当代, 泸夷与宋王朝之间的关系, 一直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 特别是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也会提及宋代泸夷的历史。但学界对宋代泸夷的历史大多是将其放置到西南民族史甚至中国民族史这样的宏大视野之下的, 缺乏从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的视角来观察泸夷问题与宋代泸州地方社会的具体关系。本文尝试从多民族地区地方社会的治理策略与朝廷、地方长官和士大夫之间治理理念的歧异, 揭示中原王朝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军事重镇型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困境。事实上, 泸州军政地位的提升, 与士大夫对泸州长官地方治理策略的期待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纠结。

一、御戎为急: 泸夷问题与北宋以来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传统

泸夷是宋代民族史以及整个西南民族史上比较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今天泸州及其附近的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地带, 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有着悠久的共同生活的历史, 在中国多民族交融与中华民族命

收稿日期: 2020-01-20

作者简介: 黄 博(1982—), 男, 重庆长寿人, 历史学博士,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吴 寰(1993—), 女, 重庆奉节人,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硕士研究生。

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留下重要的历史过程。明代陈邦瞻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就曾经在“熙河之役”和“元祐更化”之间插入了泸夷的记事。全书用了一卷的篇幅来集中叙述神宗时期平定泸夷的历史,也足见后人心中泸夷在宋代历史中的地位^{[2]409-410}。事实上,泸州在宋代史籍中比起前代有更频繁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泸夷问题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泸夷”一名得之于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对“泸州夷人”“泸南夷人”的省称。实际上宋人对于泸夷的称呼并不统一,正如刘复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泸州夷人”“泸州蛮人”之类的叫法甚多,基本上不表示其民族属性。准确地说,泸夷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包括了泸南地区的乌蛮诸部和獠人诸部在内的多民族群体^[3]。

泸夷的存在,是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特殊性的关键。在南宋中后期,以御戎为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地方治理策略成为官样文章中称颂泸州地方长官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南宋前期眉州人程敦厚有一篇给泸州守臣的“贺启”(《贺周泸州启》),乃是当时流行的四六体的官场应酬文字,颇能反映一般士大夫对泸州主政者的认知。为方便分析,全文转录如下:

授钺斋坛,建牙师阃。包山河而坐制,罄华夏以咸归。先甲所临,群情胥庆。恭惟某官三代正真,一时老成。德可久而易知,气至刚而无害。是所谓特立独行之士,固宜得非常绝异之知。矧方羁縻外徼生羌之心,掌握内属群僚之命,坐弭南征之役,永宽西顾之忧,时惟才难,独当上意。轻裘缓带,聊收颇、牧之功;簪笔持荷,归服严、徐之侍。兹播绅之夙望,为廊庙之深储。荐对徽章,益隆显绩。某首闻除目,深激懽惊,忭蹈之诚,敷宣不即。^{[4]1688}

在这篇官场常用的贺启文中,作者首先对泸州守臣的性质进行了定位,“授钺斋坛,建牙师阃”,比拟的是唐代封拜节度使的气势,夸耀的是泸州军事地位的重要。泸州地方官虽然不再有唐代节度使的职名,但泸州的地位,在宣和元年(1119)曾因“控制一路边阃之寄”,为“西南要会”,而被升级节度使州,名为泸川军节度^{[5]9406}。其次,与一般地方官的职责不同,泸州守臣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泸州地方治理的重心不在于一般的内政治理,而在于要处理好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的关系。泸州地方长官,一方面要“矧方羁縻外徼生羌之心”,处理好与周边泸夷部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掌握内属群僚之命”,权责重大,要能够做到“坐弭南征之役”,从而使朝廷“永宽西顾之忧”。因此,泸州的守臣,一方面要像战国时代的廉颇、李牧那样可以建立赫赫军功,另一方面又能像西汉的徐乐、严安那样提出一套治国理政的方略。全篇行文中,不但泸州守臣的重心应该放在边疆军事安全的立意非常明显,而且还颇有些以此为荣的味道,这与宋代士大夫对普通地方长官的期许很不一样。

事实上,泸州在宋代地位的不断上升,并不是泸州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是与进入宋代以来,泸南地区的泸夷群体日益活跃,并与宋朝政府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有关。徽宗时期平定泸夷后,“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隶泸州,连接交广,外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余县,团、纯、滋、祥州、长宁军属焉”^{[5]4047}。这样一来,泸州的辐射范围大大增加。其实,泸州从唐代起就作为中原王朝经营川南民族地区的前沿基地,唐代的泸州都督府统辖唐朝在泸州以南增置的十个羁縻州,“(贞观)十七年,置濠、珍二州。仪凤二年,又置宴、纳、奉、巩、薛六州,载初元年,置顺州。天授元年,置思峨州,久视元年,置涪州,二年罢州。并属泸州都督,凡十州。”这十州,“皆招抚夷獠置,无户口、道里”^{[6]1663}。这些隶属泸州的羁縻州县大体都在泸州长江以南的地区,泸州都督府所统羁縻十州的居民都是“夷獠”,因此泸州也是汉人与西南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

宋朝政府对多民族地区由民族冲突引发的社会动荡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宋太祖在开宝八年(975)曾经对泸州知州钱文敏说:“泸州近蛮,尤宜抚绥。”^{[7]346}所以进入宋代以后,抚绥蛮夷成为泸州一个重要内容。刘复生教授曾揭示,北宋前期,在所谓泸夷群体内部,存在着一个因乌蛮集团北进,与本土僚人部落发生冲突,由夷人内部的争斗,进而引发夷汉之间的争端,从而导致川南多民族地区一系列的边疆安全危机事件。所谓的泸夷问题,从真宗年间一直持续到徽宗年间,宋朝政府先后多次派出大军南下,才将局面稳定下来^[8]。这个过程中,泸州的军政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据学者考证,宋代泸州地方长

官有一个“权任益重”的过程,而其权重的核心内容,就是泸州地方长官军事权位的不断加重,兵权越来越重,军事职能的考量自然也就越来越重。泸州在北宋前期只是一个隶属于梓州路的普通州郡,因为泸夷北进引起泸南地区局势紧张,宋朝政府才不断提高泸州的军政地位和权力。大中祥符七年,宋廷因为“戎、泸夷汉杂居,本路钤辖在遂州,缓急不能捍御”,故而特置“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一员”,并且在随后的天禧元年(1017)把都巡检使的驻地移至泸州的江安县^{[7]2048}。到元丰年间,进一步把梓夔路兵马钤辖司移驻泸州,同时泸州知州按例兼带“泸南沿边安抚使”职衔。到徽宗时期,更是明确诏令“泸州守臣带潼川府路、夔州路兵马钤辖、泸南沿边安抚使”等职衔。南宋乾道六年(1170),宋廷对四川的军政格局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将原驻潼川府的潼川府路安抚使司移驻泸州,成为一路帅司的所在地^[1]。至此,泸州成为南宋川峡四路的一级军政机构的驻地,“以泸南为潼川府路安抚使,俾得刺举一道,自是权任益重”^{[9]3261}。泸州从此成为南宋全国十六个路级帅司驻地之一,其军政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了。薛绂在《阜民堂记》中对范子长说“今天下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亦足见其在时人心目中的份量。

加强边境地区的兵备和镇抚边外的蛮夷,通常是宋代士大夫提到泸州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文化意象。在《舆地纪胜》“泸州”条下所录的宋代有关泸州的四六文套话,大多也是推重边疆军事镇抚功能的,如王卿月《泸州到任谢表》云:“西南要地,控制一路。边阃重镇,地控云南之六诏,疆连并络之三边,虽乌言夷面久被于文明,然狼子野心每虞于猾夏。”显然,泸州地方社会治理,既包括军事功能的强化,也包括对周边,特别是泸南地区的泸夷部落可能造成的动荡随时保持警惕。而泸州地方长官偏重于军事功能的强化,也主要针对的是泸夷及川南周边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彭迈在《镇远楼赋》中强调说:“维泸川之大邦,控三巴之百蛮,置元帅以统临,总节制于侯藩。十有六州溪洞之裔夷,五十三县羁縻之裘毳。”^{[9]3079}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泸州地位的上升,实质上依靠的是泸夷在川南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泸州在宋代权任益重的另一面是,泸州主政者往往在考虑到泸夷问题的复杂性时,对权任的轻重会有不同的感受。宁宗开禧年间知泸州兼潼川府路安抚使的李寅仲的个案颇能说明问题。李寅仲上任后,主要的工作重心就是加强泸州及其周边夷汉交界地区的山寨建设。李寅仲到任后结合自己的施政经验发现,泸州“升沿边安抚使为潼川路安抚使,自去沿边之号,而权任反轻”。因为以前的沿边安抚使体制,在制度上保证了泸州地方长官对沿边山寨的人事任免权。泸州守臣兼职升级为潼川路安抚使后,虽然管辖的范围从川南三州扩大到整个潼川路,但失去“沿边安抚使”结衔,意味着泸州的军事特区属性减弱,恢复到了普通的路级帅司的常态权力格局。这样在淳熙八年(1181)以后,原隶属于泸南沿边安抚司的寨官,“除制置司存留辟置外,并送转运司定差,而安抚使俱不得与”,因此,泸州地方的军政长官反倒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寨官的人事任免权。泸州帅府失去对寨官的人事任免权的危害是,“一旦缓急,寨官之视帅府不相谁何”,由于寨官们的选任不受泸州帅府的管辖,故战时对其难以进行有效指挥。更严重的是,由于平时没有接触,泸州方面对于这些寨官“其能否皆不预知”,即帅不知将,因此李寅仲感叹这样的作法,“于边防岂不有误”^{[5]969}!

李寅仲结合自己的观察,发现泸州地区“沿边寨官之官,隄防夷徼,责固不轻”,本来是很重要的职位,按惯例拥有“任满不至生事,例升一秩,或减磨勘”的优惠待遇,因此寨官应该“且富材武”,朝廷“所以待之者不轻矣”。但是这些寨官却经常被上司抽调出去做别的事情,造成“居平不习边鄙之事”,而“任满则覬沿边之赏”,完全没有起到朝廷优待沿边官员,培养边疆军事人材的本意。所以他向朝廷建议:“沿边寨官非有军兴,不许抽差,或因缘差出,则任满不许推赏。其有任满而转运司无官注授者,见任人过满而不得代者,许从安抚司权行差辟。”^{[5]969}这一建议可以说部分地把沿边寨官的人事任免权从转运司手中夺了过来。李寅仲在泸州的施政方略,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对边疆民族地区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要随时做好准备的防范心态。

泸州与泸夷比邻而居,夷汉错杂的格局,使得双方极易发生矛盾。因此,泸州的地方治理就渐渐形成了不得不以“御戎为急”的方略。这一施政传统,体现在泸州政治文化景观的建设上,即是形成了强

烈展示军事实力以震慑周边蛮夷人群的特色建筑群。北宋修筑泸州谯门时,时任知泸州江安县的邓綰在《泸州谯门记》中表示,泸州谯门之所以要“筑为高门”,“瑰材宏规,高明显完”,追求如此这般的气势宏伟,并与泸州城外“江流下盘,山光四来”的自然风光相应,其旨在“以威以安”,而“非为观游”。因为“泸为两蜀之藩,当百蛮之冲,夷汉错居,兵多事丛,宜有郭郭之严、官府之雄以临边防,而壮戎容也”^{[4]568}。营造在观瞻上的军事威慑效果,是泸州众多地标景观建筑的建设目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泸州地方军政当局以御戎为急的执政理念。

二、阜民之政:南宋中后期理学型士大夫对泸州地方治理策略的新主张

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时任潼川府路安抚使兼知泸州的范子长将位于泸州州治的宸章阁移筑于镇远堂上,更名为“阜民堂”。范子长给汉嘉士人薛绂写了一封信,详述建堂更名的缘起,并请薛绂为新落成的阜民堂撰写一篇记文。这封信的内容与一般的请托书信不同,范子长借给新堂命名之机,道出了不少对宋代多年以来形成的泸州地方治理传统的反思,故不惮繁复,全录于下:

州治旧有宸章阁,在壮猷堂之南,轮奂之美。有感于阴阳家说者,移阁于谯门之前,揭泸州军额于上,而藏奎画于郡庠。置小屋于阁之上,为鬻盐之所,湫隘喧杂,与府治有不称。今承乏于兹,每切病之。方昕夕摩抚疲瘵,未敢议兴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镇远,后改整暇,虽规模宏壮,而无所览观,因撤阁址小屋而移兹堂于其上,稍增广之。堂之高二十有七尺,广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两屋,广袤相称。僦工于三月之壬申,落成于五月之乙亥,与壮猷、南定直如引绳,屹如三山。昭德晁公记南定楼,所谓“三屋属联,广深瓌现,蜀之府寺鲜俪者”,至是乃复旧观焉。繁花艳卉,炫昼缟夜,既宜于春,芙蕖荷芰,幽香静植,复宜于夏。视不壅而逾远,或有称于政也。因念郡之堂宇曰壮猷,曰筹边,曰南定,曰镇远,皆属意边圉,前后一律,未有以互相发也。稽诸《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职,莫急于此,此本末先后之序也。因以“阜民”更之,子盍为我记诸。^{[4]2433}

在这封信中,范子长注意到,泸州过去修建的兼具纪念性与展示于一体的建筑,如壮猷堂、筹边堂、南定楼、镇远楼之类的命名,“皆属意边圉”,即在泸州的标志性景观上,“前后一律”地集中展示了泸州地方当局对边疆安全问题的重视。壮猷堂、筹边堂、南定楼、镇远楼,从名称上来看,都是在强调泸州的军事重镇功能,壮猷堂和筹边堂的喻意比较明显,通过字面意思即能明白其意,而南定楼和镇远楼则稍为曲折一点。

南定楼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其时主政泸州的晁公武主持修建。南定之名取自诸葛亮《出师表》的语意,“绍兴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楼,取诸葛孔明建安五年《出师表》语为名”^{[11]3162}。按,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有“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话。晁公武取名南定楼,正是要借诸葛亮渡泸南下,平定南中的故事,表达自己镇抚泸夷,安定泸州社会的治理策略。镇远楼为泸州名胜,为宁宗初年主政泸州的李寅仲所建。李寅仲在其所写的《镇远楼记》中点明,自己修筑此楼,不是为了“欲快一时登临之乐”,更不是为了给“嘯歌娱燕”创造一个风景名胜的地方,而是为了“折冲樽俎而厌难于无形也”。他说:“傥溺于燕安而谓鸩毒之可怀,忽蜂蚕之肆毒,虽欲乐此得乎!”故取名“镇远楼”,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缮治甲兵计士,固为边备之常”^{[4]2327},随时提醒大家,安定边疆是泸州的重要责任。范子长到泸州后,对泸州地方当局长期以来偏重边疆军事安全的治理策略颇不以为然,借阜民堂的命名,提出了“阜民之政”才是地方官长的首要责任。他借《周官》的经典论述,强调“阜成兆民”,才是“州牧之职”,且在州牧之职中,这是“莫急于此”的内容,因为地方官长要办的事情众多,而这是“本末先后之序”。

范子长,字少才,为成都府双流人,早年曾知飞鸟县,后升任太常丞、东川提刑^{[12]662}。《宋元学案》称

其为乾道、淳熙以后张栻南轩之学在蜀中的嫡传^{[13]2405}。范子长出生于宋代四川最有名的成都范氏家族,该家族从北宋仁宗时的范镇中进士起,经哲宗时的范百禄、范祖禹以学术名世,一直延续到南宋,先后考中进士的有27人,名列《宋元学案》的有7人,既是仕宦名门,又是学术世家^{[14]286—295}。范子长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理学习型士大夫对地方治理的看法。薛绂,字仲章,嘉定府龙游人,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精治易学,人称符谿先生,与范子长并列所谓的二江九先生的成都学术交流圈^{[13]2415}。薛绂在应邀所写的《阜民堂记》中,以《周礼》等儒家经典为据,指出地方官长的责任,“在于阜成兆民而已”。他说,“阜者所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兴于化也。井田之法,沟恤之制,乡遂之赋,未作之禁,均其土田,修其稼政,平其赋敛,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纤悉备具。民生厚而有恒心,于是教化行,习俗美,而礼乐兴焉,所谓成于乐也。”^{[4]2434}显然,阜民之政关注的地方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在地方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而终极目标是要在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实现儒家所追求和期待的风俗淳美、礼乐大兴。在薛绂看来,泸州当局地方治理的方针策略,却在泸州地位越来越高,泸州地方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之后,越来越偏离了儒家阜民之政的理想。

薛绂指出,南宋以来,泸州地方当局从“所统不过三郡”的泸南沿边安抚使,升级成了“尽统一道”的潼川路安抚使。同时朝廷对于泸州地方长官的选任也越来越重视,往往是“选用重臣”,使得主政泸州的“名公巨卿项背相望”。然壮猷堂、筹边堂、南定楼、镇远楼这些名称的命名,反映的是地方官在“规略”上的偏差,“观其所以名堂者,规略亦可考也”。即都偏重于民族问题的解决,从而施行的是强化军事威慑力的政策,忽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薛绂甚至引《诗经》赞美“公刘”的典故,来阐述像泸州这样逼近蛮夷的边境重镇更应该以阜民之政为首务:

余观诸《诗》,所谓笃公刘者,美其厚于民。豳之地逼于西戎,公刘乃不以御戎为急,考之一诗,治其疆场,积其仓廩,既富且强,始修侯粮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修,不至馆舍锻砺,无不尽其精密,为三代之政者,阜民之政莫悉于此。^{[4]2434}

薛绂认为,公刘的功绩,不在于御戎,虽然他有御戎之功,公刘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不把御戎作为首务,而是大力修治民政,发展经济。先做到了人民安居乐业,才开始军事力量的经营,“既富且强”,要先富了,然后才能强。这是“守先王之道”的君子为政应该效法的典范。薛绂感叹:“生民之困甚矣,随时设施,各思其职,而尽其心焉,则利泽之可以加于物者,或亦庶几焉!”他接着说,孟子在战国的乱世,也不放弃“论井田、论耕桑”,就是“欲使民养生送死无憾”。孟子“初无一寸之柄,撮土之封”,尚且能够坚持儒道不放弃,“厚民之学不懈于心,不绝于口如此”,借以讽喻“居古方伯连帅之职,分牧养之任”而主政泸州的官员“如之何而弗思哉”!所以,具有儒家理想的士大夫如果主政泸州,当施行儒家先贤的阜民之政。

然而,范子长在以阜民堂表明心迹的同时,其“阜民之政”的地方治理理念则受到质疑,“泸戎迫近夷徼,近岁间多窃发,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边之策宁复可缓!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面对质疑,薛绂认为,在边疆民族地区,地方长官更应该重视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因为民族问题都是经济问题造成的,经济问题解决了,民族问题也就解决了。他说:“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远能厚德允元,以至于难于任人,皆内修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蛮夷率服,兹岂迂乎哉!”^{[4]2435}

从宋代泸州地区民间舆论的体验来看,通过修治内政然后蛮夷率服的地方治理策略似乎更受当地百姓欢迎。自北宋中期泸夷问题爆发以来,前往主政泸州者众多,“名公巨卿项背相望”,平定泸夷立下军功的将官也为数不少。但在泸州民间,口碑最好的却是宋初一个在官场中很不起眼的驻守在泸南地区的巡检使柳光熙。在其死后,长宁军(涪井监)民间给他修建了祠庙加以供奉。到徽宗时柳侯祠正式获得朝廷承认,赐名“忠佑祠”。据蒲杲《忠佑词记》所述,柳光熙坐镇泸南时,“教令有肃,动作有度”。因为内政做得好,而赢得了泸南远近“十州五围三十九县之夷,悉向慕之”的施政效果,泸南地区亦鲜少泸夷问题。但当柳光熙被当时的“泸帅”谗言陷害而调离之后,泸夷问题才凸显恶化。其起因恰恰是经

济问题,“自侯不还,群夷狼顾,薪刍之输,不以时入”。泸夷不但拒绝向宋朝缴纳贡赋,还霸占了涪井监的盐井,“泸州鼓铸为其所霸”,夷汉之间的经济纠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涪井盆牢之利,汉夷争之,乍服乍叛,迄于政和,百二十余年,一方骚扰,国用虚糜”^{[4]3183}。

事实上,比起军事力量对川南少数民族各部的威慑作用,发展地方社会的经济,改善民生,提升地方整体的经济实力,更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嘉定初年时任成都府路提刑的李焘曾言,“照得两蜀边面旧来体例,凡遇蛮贼作过,必先止其岁犒,绝其互市”,即切断川南少数民族部落从四川内地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迫使那些与宋朝发生冲突的少数民族部落屈服,“盖蛮贼生理所资,悉仰给于汉”,如果“岁犒”“互市”都被禁绝,“则其部族之内即自窘困,自然悔恨”。李焘认为,这一办法非常有效,“前后官司区处之善,皆无出于此”。但是切断夷汉之间的贸易,对于宋朝开展互市的州县却也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损失。如嘉定四年(1211)马湖蛮与宋朝发生冲突后,成都府路立即在嘉定府停止了对马湖董蛮的岁犒,但隶属潼川府路,直接听命于泸州帅司的叙州当局,却“于互市一事全然不肯任责,妄乱申陈,巧作推避”,诸蛮把在嘉定夺得的物资,“贸易于叙州之境”,而“叙之边民,利于赢掠十百之利,上下共享,故不乐于互市之绝”。因此于成都路方面,“虽已累次移文叙州禁约,其本州终是奉行灭裂。”^{[5]9902-9903} 如此的经济封锁,自然不能起到任何实际作用。所以如果没有阜民之政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在多民族地区纯粹依靠军事力量的震慑,想要实现地区稳定也是很难做到的。

泸夷与宋朝之间长期冲突的历史,使得泸州地方当局的治理重心自然倾向于以“御戎为急”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取向,这一偏好逐渐成为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的政治传统。但南宋理学习型士大夫站在儒家理想主义的立场上,主张“阜民之政”才应该是地方社会治理的施政重心。这一主张虽然因为带有过于理想化的色彩而在当时就遭到时人的质疑,但理想与现实有时也不完全矛盾,内修政事恰恰是“蛮夷率服”的前提,民族问题很多时候和经济问题密不可分。可以说,宋代泸州地方社会治理策略的争论,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生动案例,其中所折射出的历史细节颇值得我们深思。

[参 考 文 献]

- [1] 刘复生. “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J].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4(6).
- [2] 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 [3] 刘复生.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7(1).
- [4] 傅增湘原辑, 吴洪泽补辑. 宋代蜀文辑存校补[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 [5] 徐松辑, 刘琳等点校. 宋会要辑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6] 刘煦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8] 刘复生.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J].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4).
- [9] 王象之编著, 赵一生点校. 舆地纪胜[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10] 邓綰. 泸州谿门记[M]//永乐大典.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11] 马蓉, 陈杭, 钟文, 栾贵明, 张忱石点校.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12] 李心传撰, 徐规点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13] 黄宗羲原撰, 全祖望补修, 陈金生, 梁运华点校. 宋元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14] 胡昭曦. 宋代“世以儒显”的成都范氏家族[M]//胡昭曦宋史论集.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The Debate between Luyi and Luzhou of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Multi-ethnic Areas

Huang Bo WU Huan

(1.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2.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3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Luyi wa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particularity of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in Luzhou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urongweiji", a local governance strategy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frontier military security, was a traditional expression of praising Luzhou local governor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officialdom.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border areas so that the barbarians outside the border dare not act rashly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age used by the cultural elites in the Song Dynasty when they wrote about Luzhou. The upgrading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Lu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actually depended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uyi" on southern Sichuan. Therefore, the policy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Luzhou had gradually formed the tradition of so-called "Yurongweiji". On the other hand, some cultural elites and officials believe that the local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authorities is wrong because as the local statu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local officials have more and more power, the local governance ideas are increasingly deviating from the Confucian ideal, which being called "fumingzhiz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compared with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military strength on the ministr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ern Sichu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was also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southwestern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Song Dynasty; Luyi; Luzhou; soci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刘力]